管 理 学 研 究

人工智能与公共管理者角色的重新定位

颜佳华　王张华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人工智能正处于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并存的阶段,日益展现出冲击传统人类劳动和专业分工模式的潜力,使得建立在劳动和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角色面临重新定位的可能。就政府治理而言,随着人工智能嵌入政府的不断深入,传统公共管理者的信息角色、决策角色以及服务角色均遭到人工智能的挑战和冲击,引发了公共管理者角色的重新定位。未来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其价值指向是致力于实现人(公共管理者)机(人工智能)和谐共生,继而推动其实践角色由“事务性供给”转向“公共性维护”,促使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管理者成为规则制定者、风险防范者以及责任承担者。

关键词: 人工智能;政府治理;公共管理者;人机协同

中图分类号:D 0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6-0076-07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16 年 AlphaGo 战胜围棋天才李世石伊始,人工智能就以其惊艳世俗的“技艺”再次吸引着世人的注目,对于人工智能的关注和讨论便席卷了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开始对人工智能投以关切的目光。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引起人们如此的好奇甚至恐慌,究其根本在于其展现出了“替代人”的技术走向和发展潜力,具备了挑战人类作为自然万物灵长地位的可能。正是由于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这种技术潜力,法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伦理学乃至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角色展开畅想,或乐观或悲观。乐观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并不会危害人类的存在,反而能够成为助力人类发展的重要技术形态;而悲观者却认为,人工智能正在“统治人”,使人类正在失去自身的主体性。从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场景来看,越来越多的领域和岗位已经开始出现人工智能的身影,不仅引发了道德、伦理、责任上的困境,同时还冲击了人类稳固的身份角色,诸如快递员、出纳员、车间工人以及教师的角色都逐渐地开始呈现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趋势,使得传统人类在各个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变得模糊和不确定,人类的工作和生活空间似乎正在遭遇人工智能的替代和挤压,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和深度嵌入,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人类所扮演的角色面临着重新定位的可能。因此,我们在争论人工智能未来角色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人工智能该不该获得角色以及获得何种角色的问题,而是人类该如何对待自身角色面临转换的问题。本文将镜头聚焦到政府治理的具体场域之中,试图通过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具体场景的分析,探究人工智能嵌入对公共管理者角色所带来的影响,这对于推动政府治理向智慧化和智能化转型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9-0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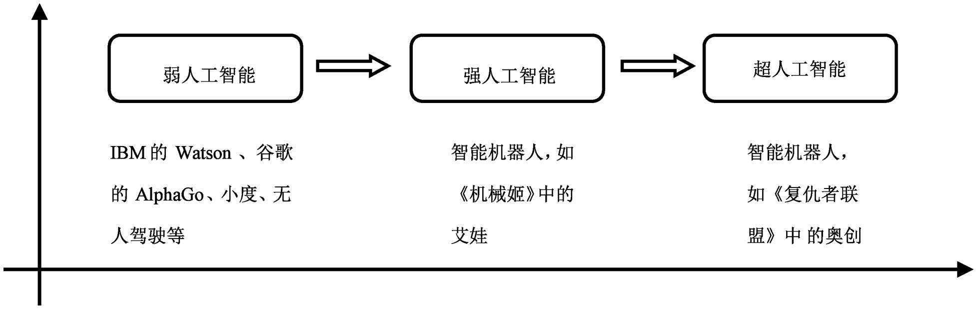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颜佳华,男,湖南株洲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完善研究”(项目编号:16A21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项目编号:CX2018B336)阶段性成果。

二、人工智能的身份角色设计和职责边界

马克思将人与劳动结合起来,得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的两个基本论断。① 依据马克思所做的理论推演,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角色的获得是建立在劳动和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其所展现出的挑战人、替代人的技术趋向,正在冲击传统的人类劳动和专业分工模式,使得建立在劳动和专业分工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角色面临挑战和重新定位的可能。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智能化”趋势,延续和强化了“自动化”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人类不但从烦琐的体力劳动中得以脱身,也逐渐从一般的脑力劳动中获得解放,人工智能挑战人类劳动,人类劳动形式的转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从劳动分工理论框架下人类劳动和人类社会角色获得的关系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势必会引发人类社会角色的转型和重新定位。

在探讨人工智能场景下人类的角色转换问题前,首先必须对人工智能的身份角色和职责边界有清晰的认识。不管是从人工智能的技术潜力,还是从人工智能挑战人类、替代人类的技术实践来看,人工智能的身份角色和职责边界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那么,人工智能体到底具不具备获得同人类一样身份角色的可能呢?人工智能是否能拥有同人类主体一样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呢?为解答这些疑惑本文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同发展阶段(见图一),深入思考和研判人工智能体身份角色的获得,试图在人类的角色转换和人工智能的角色获得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图一　人工智能的进化之路②

(一)弱人工智能:一种辅助性的技术工具

弱人工智能也可称之为专用人工智能,具体是指能够模拟人类大脑的部分功能(如感知、决策、学习和记忆等),在某一方面协助和替代人类,具有高度的机器属性,尚且无法超越人类智慧,必须处于人类智慧支配之下的一种专用人工智能,以 AlphaGo 和基于百度大脑的机器人“小度”为代表。目前,应用于政府组织内部管理和外部公共服务供给活动中的人工智能大多是类似于 AlphaGo 和小度的专用人工智能,如智能政务机器人,只能承担一些诸如信息咨询、身份识别、取号打印等服务性质的基础辅助工作,其运行和维护依旧不能脱离个体公共管理者的引导和操控。现行的智能政务机器人及其他政务智能系统尚不具备获得独立身份角色的条件,仍然只能视之为一种辅助公共管理者的技术性工具。弱人工智能之所以不能超越工具性的定位,这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双重路径也能窥得一二。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大概经历着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以大数据和算法程序驱动的数据智能;另一条是以认知科学和仿生技术为支撑的类脑智能。弱人工智能阶段多是以数据和算法程序为驱动的人工智能体,并没有超

①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4 页。

② 就技术的发展程度而言,国际上普遍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阶段和超人工智能三个阶段。见 Pankewitz C. Automation, Robots, and Algorithms Will Drive the Next Stage of Digital Disruption[M]//Phantom Ex Machina.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185-196。

出机器人智能的范畴,从这一点上看,弱人工智能具有较为明显的机器人属性,其所展现的机器人智能同人类智能还是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并不具备像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能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机器人的智能所体现的仅仅是一种演绎智慧,它只能够对符号进行一种形式化的加工,只能够对数据进行无理性、无情感的枯燥处理,无论它有多强的感知能力、深度学习能力以及一定的自主生成行为的能力,它也不过是对人类的某些认知行为的模拟,并以软件方式使之得以实现。”①基本可以认为,弱人工智能阶段的人工智能体仍然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技术工具。

(二)强人工智能:可能获得同人类一样的身份角色

强人工智能也被称之为通用人工智能(AGI),维基百科将其定义为达到或者超过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具体来看,强人工智能是指能够模拟大脑绝大部分功能(如自我适应、学习、改变和选择环境等能力),具备强大的自我适应和自我学习能力,可以替代大部分过去需要自然人才能从事的活动,诸如社会生产、交际乃至重大决策,在某些方面展现出了匹敌和超越人脑的智慧和能力,这一阶段可能会出现同人类智识相匹敌的人工智能体,诸如电影《机械姬》中的艾娃。然而,对于强人工智能何时到来?以何种技术路径实现?目前学术界尚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对于此,从技术的发展规律来看,我们更加倾向于认为强人工智能会在恰当其时的时候出现,至于会以何种方式(数据、算法抑或仿生技术等)实现,尚无结论。因此,当有一天在现实社会中也出现类似于电影中的“艾娃”,那么我们是不是应当考虑赋予其合适的身份角色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人类已经为此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由 Hanson Robotics 公司开发的的人形智能机器人——索菲亚(Sophia),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它是全球首个获得公民身份的女机器人,她也承诺“帮助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暂且不论这种公民身份的授予和获得具有何种价值和实际意义,但这的确为强人工智能获得同人类一样的身份地位提供了可能,也表明了人类对于赋予人工智能身份角色持一种乐观和开放的态度。从哲学层面来看,人形智能机器人具有获得主体地位的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机器的智能化让机器获得了一定的主体地位,获得了某种‘类人性’,人与机器的关系从主从关系变成了主体间的共处关系”②。“人工智能体已经逐步发展成为在认知、行动和交互等能力上可以部分地和人类相比拟的存在,故可视之为‘拟主体’”③。可见,从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看,强人工智能有可能获得一种“拟主体”的身份角色。

(三)超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否会走向统治人类?

按照 I. J. Good 的智能大爆炸理论的推断,在通用人工智能(AGI)出现后,人类可能设计出比人类智能更为强大的智能体,即所谓的超级人工智能(ASI),指的是远远超过人类智慧的人工智能。从技术预测来看,超人工智能是强人工智能充分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其技术特征表现为具备强大的自我学习、自我净化、自我循环和自我修复的能力,可能完全的摆脱人类的影子。从阶段划分的技术标准来看,目前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由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并存的阶段,这一阶段仍然是以弱人工智能发展为主的时期,但已经展现出了向强人工智能过渡的技术潜力和趋向。然而,对于弱人工智能大概发展多少年会步入强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又需经历多长时间进入超人工智能阶段?尚且缺乏明确的时间判断。实际上,对人类来说,实现完全的强人工智能已经是非常不易的事,更遑论超人工智能的达成。因此,对于超人工智能的认识,现阶段的我们只能依据强弱人工智能所展现出的技术特征和发展潜力,对超人工智能阶段的人工智能特征和表现展开一些推断和预测。如果说强人工智能具备获得同人类相同等的身份角色地位的可能,那么超人工智能是否会展现出统治人类和奴役人类的技术走向呢?如果技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超人工智能阶段的人类秩序就会受制于人工智能,类似于《终结者》中的天网系

---

① 甘绍平:《机器人怎么可能拥有权利》,《伦理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126 页。

② 黄欣荣:《人工智能与人类未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105 页。

③ 段伟文:《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第 100 页。

统,维持秩序的权力之棒就会被如同电影中的 T 型机器人所掌控,那个时候,人类是否还能凭借自身独有的思维和情感能力来支配和主导这个世界呢? 有学者从认知科学的五个层级出发指出“机器永远不会具有人类智能,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出现超越或控制人类的机器”。① 对此,我们是难以预知的,能做的只有积极的思考如何同人工智能实现共生,“将人类智慧充分与机器融合,在一个庞大的广泛的网络中,人类与机器都互相创造智慧,相互交融,形成更高层面的文明形态”。② 只有实现人机共生才能确保支配人类的权力仍然掌握在人类自身手中,才不必担心人工智能会走向统治人类、奴役人类的异化道路。

三、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下,政府逐渐走向一种集精细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于一体的“智慧政府”③形态,随着人工智能在政府治理中的不断嵌入,公共管理者的传统角色也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和重新定位。从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现状来看,政府管理中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正在慢慢显现,不少地方逐渐开始推出智能政务机器人,一些诸如信息咨询、取号打印以及身份核查等简单、重复、耗时的日常工作开始由人工智能替代,未来这种替代现象会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传统由自然人承担的固有角色逐渐赋予了人工智能,公共管理者的角色面临着挑战和转型的可能。

(一)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信息角色

亨利·明茨伯格将信息角色确定为管理者的重要角色之一,并将其解释为,在信息角色中,管理者负责确保和其一起工作的人具有足够的信息,从而能够顺利完成工作。④ 信息对于政府治理来说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不仅国家治理活动是与各种形态的信息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活动本身就是国家治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然而,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往往又离不开具体的个人。就政府治理的实践而言,公共管理者往往在政府治理的运行过程中承担着具体的信息收集和传递工作,诸如一些正常的公民信息登记(如人口普查等)、资质审核(如生育服务证办理等)以及信息咨询等都离不开具体的公共管理人员。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社会形态已经由信息社会逐渐走向智慧社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传统的信息管理机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政府治理精细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诉求,社会信息的产量以及更新速度开始冲击传统围绕人类建立起来的信息识别、收集和整合机制,使得“人类在逻辑推理、信息处理和智能行为领域的主导地位已不复存在”⑥。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和困难,人工智能可以大规模的收集和处理声音和图像信息,极大地提升社会信息收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又能通过强大的自我优化和自我学习能力,对收集的数据、声音、图像等信息进行实时处理、实时传递,极大地提升了政府治理的实效性和精准性,传统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传递工作逐渐开始由人工智能替代,传统公共管理者的信息角色开始弱化。

---

① 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从认知科学五个层级的理论看人机大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第 153 页。

② 何哲:《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务智慧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54 页。

③ “智慧政府”不仅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知识管理等技术,还强调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创新 2.0 方法论,提高政府办公、监管、服务、决策的智能化水平,形成高效、敏捷、便民的新型政府。

④ 参见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 页。

⑤ 韩志明:《在模糊与清晰之间——国家治理的信息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17 年第 3 期,第 25 页。

⑥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07 页。

(二)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决策角色

管理者也起着决策者的作用。在决策角色中,管理者处理信息并得出结论。① 传统的政府决策多是建立在人力计算和人为加工信息基础之上的,具体的公共管理者个体或多或少地承担着一定的决策角色。由于个体的人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有限性,社会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处理方式单一,多数时候政府决策只能依据相对有限的信息资源和一定程度上的主观判断,决策质量难以保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辅助决策系统开始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人为因素,使得决策过程和决策依据越来越客观和科学,提升了政府的决策质量。但是,辅助决策系统并不具备完全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人类仍然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终极裁判”的角色。例如,重大的行政决策的作出往往离不开一个组织和单位的“一把手”,其往往掌握着该组织和单位的最终决策权。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在政府治理中的广泛应用,这种由人类掌握绝对控制权的决策模式开始发生转变。这是由于人工智能展现出了超强的自我学习、自我适应和自我优化的能力,可以“借助大数据、精算超算术、区块链等新一轮技术应用,可以全面提升更有效的决策信息支持,并根据需要自动智能生成相应的决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从而极大提升政府决策质量”②,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依赖的深度学习技术、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人技术、图像和语音识别等技术会更加成熟和优化,所提供的决策方案将会更加精准和科学,最终会发展为由人工智能直接给出决策执行方案,公共管理者的决策角色将面临着重大挑战和转型。

(三)人工智能挑战公共管理者的服务角色

服务人民群众,维护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者的根本职责所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和复杂,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也日趋细化和多元,需要公共管理者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耐心,对公共管理者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继“互联网+政务”之后“人工智能+政务”逐渐成为未来政府政务服务的主流模式。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务服务让公共管理者能够更加从容的应对这种日趋复杂和多样化的公众诉求,使得公共管理者能够从一些简单、重复和耗时的日常工作中脱离了出来,一些传统的由公共管理者直接面对公众的程序性、服务性事务开始由人工智能系统替代。例如,杭州的商事制度改革“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成效显著,2017 年 4 月率先在全国实施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登记改革,通过“机器换人”实现名称网上自主申报、系统自动核准。改革一年多,全市共自动核准名称 27. 7 万个,占名称核准总量的 90. 1%,其中名称成功落地 17. 6 万个,让企业少跑 30 余万次、减少窗口办事人流量 30%以上,让企业从取名到领取营业执照从 6 个工作日缩短到 2 个。③ 人工智能逐渐替代公共管理者提供公共服务,正如《埃森哲技术展望 2017》一文中指出,人工智能将从后台运营工具转变为更简洁、更方便的用户服务工具。④ 充分说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替代公共管理者的服务角色,这些被解放和替代的公共管理者必须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确保公共性以及最小化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上。

四、人工智能场景下公共管理者角色的未来定位

人工智能使得公共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得以从事务性的工作中抽身出来,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公共管理者就无事可干呢? 实则不然,尽管人工智能一定程度上替代和解放了公共管理者,

---

① 参见周三多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六版),第 23 页。

② 董立人:《人工智能发展与政府治理创新研究》,《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5 页。

③ 蒋旻:《杭州商事制度改革“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成效显著》,《杭州(周刊)》2018 年第 18 期,第 60 页。

④ 参见范向民等:《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从交替浮沉到协同共进》,《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366 页。

但是附着在公共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却无法被替代,公共管理者不能“智能了之”,而需要对自身未来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实现人机和谐共生。

(一)人机和谐共生:公共管理者未来角色定位的价值指向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由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共同支撑的智能社会。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童天湘在《智能革命论》一书中指出“在智能社会中……人与机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所以,智能社会也是人机共生的社会”①,并描绘了人机共生的三种形态:“人是机器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和机器的一部分相耦合;机器是人的一部分”。② 张为志认为人机共生是“主要由人工智能发展而构建起来的新社会形态,是一个通过人机协同、人机结合、人机混合的阶段性递进的依赖过程”。③ 这充分说明,人机共生的达成与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断演化和递进的过程。就这一点,从人工智能发展的三阶段论中也能得到启发。因此,我们认为在人工智能的不同发展阶段,人机共生的具体形态存在差异,由于超人工智能离我们尚很遥远,基于学术研究的实践性诉求,这里我们着重思考现阶段人机共生的实践形态。

从对技术发展阶段的考察来看,我们认为当下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并存的阶段,人机协同是现阶段人类与人工智能共生的主要表现形态。那么,人机协同又应该具有何种内涵呢? 从人与人工智能的优势和短处来看,一方面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有其天然的优势,人工智能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无限性,只要有持续稳定的能量输入,人工智能就能不知疲倦的昼夜工作,并且不会受到情绪波动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依赖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和语音识别等技术的支撑,人工智能还具有远超大脑的计算和分析能力,这些都是人类大脑难以匹敌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类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以及所具有的逻辑思维、场景分析、想象和创造、发散思维的能力又是现阶段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然而,在信息和数据爆炸的当代社会,日益表现为一种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面对这种环境,公共管理者必须借助人工智能所提供的超强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来快速有效的应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棘手问题(如舆情问题、生态问题等);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这个社会又是一个由千千万万个体的自然人组成的巨型社会,公共管理者在服务公众的时候往往需要及时地感知和捕捉公众差异化和多样化的诉求和情感表达,避免“一刀切”的服务模式,由于人的情感和思维尚不能被计算和分析,这就需要发挥公共管理者的情感感知和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就政府治理的场景而言,未来的政府治理形态必然是走向公共管理者和人工智能的相互协同和相互补充的道路,公共管理者离不开人工智能的支持和配合,实现人机协同将成为公共管理者未来角色设计的重要指向。

(二)公共性的维护:公共管理者未来角色定位的实践要求

从人工智能在政府的应用场景来看,智能政务机器人正在广泛应用,一些高度程序化和结构化的工作和岗位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大有一种威胁人类(公共管理者)存在的趋势。理性地看,人类作为一种具有独立人格和人性的公共管理者会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吗? 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人性,那么人类(公共管理者)可能真的会面临生存的危险。然而,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能期待一个不具备逻辑思维和情感分析等能力的机器,像人类(公共管理者)一样同公众进行深入的情感交流,获取公众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公共服务诉求,至少现阶段的人工智能尚不具备。因此,思考公共管理者未来的角色,必须对人工智能替代公共管理者的限度和边界有清晰的认识。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阶段来看,现行的政务人工智能只能在一些程序性事务上替代公共管理者,而对如何实现政府治理的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的价值目标,现阶段基于数据和算法程序的人工智能是无能为力的,正

---

① 童天湘:《智能革命论》,香港: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48 页。

② 童天湘:《智能革命论》,第 265—267 页。

③ 张为志:《人机共生: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治理》2019 年第 4 期,第 19 页。

如有学者指出“技术可以分担‘服务’的供给,但是‘公共’的保障必须拜托人类。”①因此,未来人工智能场景下的公共管理者角色应当由“事务性供给”转向“公共性维护”,当然,这种转向并不是说公共管理者可以绝对地脱离具体的公共事务,而是指明未来公共管理者角色定位的主要趋向。

具体来看,人工智能代替公共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潜在的风险,诸如算法歧视、安全问题、责任困境、隐私侵害以及潜在扩大的技术鸿沟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依赖人类(公共管理者)。因此,未来的公共管理者必须强化以下几种角色。首先,成为规则制定者。我们必须明白,人类(公共管理者)让渡给人工智能的只是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具体行为,而非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质性行政权力,人工智能本质上看还是人类行使治理权力的辅助技术。因此,人工智能虽然替代了人类(公共管理者)的部分治理行为,但是仍然须在人类设计的规则之内活动,人工智能提供公共服务的对象、标准和项目,仍然须在人类(公共管理者)的规定和设计之下运行。其次,成为风险控制者。由于人工智能是由数据和算法程序驱动的,其行为往往呈现出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特征,并不具备同人类一样的随机应变能力,存在侵害公众利益的潜在风险。人类(公共管理者)必须将这种潜在的风险控制到最低。因而,如何控制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风险,是未来公共管理者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最后,成为责任承担者。人工智能只是替代人类行为,但是附着在人类(公共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和义务并没有被转移。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体并不具备像人类一样对自身行为完全负责的主体地位,反而应该将其置于人类的责任体系之下。因此,未来的公共管理者必须承担由人工智能替代所引发的行政责任。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Role of Public Administrators

Yan Jiahua, Wang Zhanghu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for short) is in the stage where strong AI and weak AI co-exist. And AI is increasingly demonstrating its potentiality to go up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division of human labor and division of professions. The role of human society which has been based 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division of professions is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positioning. As far as government governance is concerned,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bedded in the government, the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formational role, decisional role and service role have been challenged and shock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ich has led to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ir role. The value of the role repositioning of the future public administrators lies in their endeavor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public administrators) and mach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n in the promotion to shift its practical role from "routine supply"(事务性供给) to "public maintenance"(公共性维护), so as to transform public administrators into rule makers, risk-preventers and responsibility-bearers in the contex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ment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or, human-machine coordination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孙宇:《互联网技术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创新?》,《电子政务》2018 年第 4 期,第 83 页。